

中国应加强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因素的研究

马 戎^①

摘 要: 开展中国民族关系的跨国横向比较研究, 需要选择几个可供比较的参考系。在世界各多族群大国当中, 重要邻国俄国与我国分享几个重要的共同特征, 可以作为我国民族研究最重要的参考系。苏联解体后, 西方学者、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学者都对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学者今后如何开展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关键词: 苏联解体; 苏联民族关系; 民族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 (2017) 04-0001-09

中国作为一个国土辽阔、族群众多、历史悠久的古文明大国, 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特殊的位置。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一度迟滞, 西欧各国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推动下, 政治思想、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现代教育和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 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以鸦片战争为起点, 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下, 被动地走上了一条从传统帝国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变革转型之路。在这一过程中, 中原地区与西部边疆群体之间的关系, 在各种内外矛盾交织作用下, 经历了无数次的冲击与坎坷, 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大陆才得以重新建立统一的行政体制并开始迈入工业化进程。20 世纪 50 年代直至 70 年代, 在革命浪潮和“土改红利”的基础上, 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构建的阶级情谊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 克服了各族之间传统的族源、语言和宗教藩篱, 中国各族广大民众之间一度建立起情感相通的阶级认同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 “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和对雷锋等英雄榜样的学习热潮, 超越各族之间的语言、宗教等文化隔膜而树立了新的文化伦理认同。“祖国山河一片红”, 各族广大民众都从内心热情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终结,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当中“极左”错误的公开批判、大量冤假错案的高调平反和“伤痕文学”的广泛流传, 意识形态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彻底否定, 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工作, 通过行政手段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转化为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在这一“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和所有制的转型过程中, “阶级认同”作为各族之间的凝聚纽带迅速消解, “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和雷锋等英雄人物黯然失色, 全面否定“文革”十年, “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成为一面“政治正确”的旗帜, 有些地区的“落实政策”甚至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同时, 由中央主导在民族和宗教工作领域出现各类“拨乱反正”的政策调整, 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以少数民族群体为对象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正是这个新的政治潮流, 在中国社会中重新构建了“民族认同”, 并引导各族精英和民众开始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待身边发生的各种经济矛盾、治安问题、司法公正和社会冲突。

在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 30 多年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由于工业基础水平不一样, 体制改革不同步, 沿海地区与西部边疆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教育质量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中央政府自 21 世纪初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推动了东西部之间大规模人口流动, 使这些区域差距具体和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加上境外政治和宗

^①作者简介: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 100871)。

教势力的影响,中国近年来民族关系出现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2008年3月14日和2009年7月5日先后发生在拉萨和乌鲁木齐的大规模暴力恐怖事件,使全国人民都感受到我国民族关系已出现重大变化,后续暴恐事件的持续发生,不仅使中央政府开始把西部边疆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也使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民族问题。

一、苏联/俄罗斯是我们开展民族问题比较研究的重要参照系

在对中国民族关系进行跨国横向比较研究时,我们首先需要选择在一些重要领域可供比较的几个参考系。在世界上各多族群大国中,特别具有借鉴意义的是我国北方的重要邻国俄国(包括沙皇俄国、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三个时期)。尽管美国、印度、巴西等大国境内也生活着在体质、族源、语言、宗教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许多群体,但是俄国与中国分享更多的共同特征:一是19世纪后期两国的皇权体制和境内族群格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尽管中国是保持东方文明传统的东亚帝国,沙皇俄国自彼得大帝后开始学习西欧,但在不同程度上,两国都背负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并面临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二是在20世纪初,两国精英都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通过武装斗争先后建立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三是两国在20世纪末都面临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裂活动。中国在这几个方面与俄国分享的共性远远超过中国与美国、印度、巴西等其他世界大国分享的共性。

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与学术交流长期中断,直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逐步恢复。因此,中国学者的苏联研究、特别是对俄国各历史时期民族关系演变的研究非常薄弱。目前,中国留学俄罗斯的学生人数远远少于留学美国的人数^①,能够流利阅读俄文档案和文献的中国学者人数远远少于阅读英文出版物的学者人数^②,国内出版的介绍和研究苏联/俄罗斯的学术著作也远远少于介绍和研究美国的著作。但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今天仍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核大国和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在21世纪国际政治博弈中最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因此,目前我国外语语种学习结构和社会科学各领域中俄国研究严重比例失调的现状,需要政府、教育界和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指导下于1921年正式成立的,曾经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建党后的政治纲领也遵循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联邦制的基本思路。^③1949年后,中国参照苏联的做法也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为每个国民确定“民族”身份,为少数民族设立不同层级的自治地方,先后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群体优惠政策。除了没有成立联邦制国家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我们必须承认,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对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91年,苏联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分裂为15个主权国家,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在自治共和国层面也出现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车臣自治共和国。1990年和1991年南斯拉夫各自治共和国先后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联邦最终以民族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为单元分裂为7个国家。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以民族自治行政区组成的联邦体制是否为国家分裂埋下隐患,这一议题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换可能采取几种模式:第一种是社会革命,原有政权被武力推翻,由领导武装革命夺权的政治集团组建新政权,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属于这一种;

^①2015年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人数为30.4万人,而留学俄罗斯的中国学生仅为2.5万人,在排名榜中列在美国、澳大利亚(13.6万人)、韩国(9.9万人)、英国(9.3万人)、加拿大(8.7万人)、日本(7.8万人)、新加坡(5万人)、德国(3万人)和法国(3万人)之后,居第10位。<http://learning.sohu.com/20161213/n475735926.shtml>

^②中国学校外语课程学习当中,学习俄语的人数规模排在英语、日语、韩语、法语、德语之后,居第六位。<http://tieba.baidu.com/p/139371919>

^③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 (上)》,《领导者》2011年2月刊。

第二种是军事政变，由军队推翻合法政府并组建新政权，20世纪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更替采取的是这种形式；第三种是在民主制国家通过合法选举，由选举获胜的政党组建新政府，实现政党轮替；第四种是在外部政治与军事势力的直接干预下，建立由外部势力直接操纵的傀儡政权（如美国发动的2001年阿富汗战争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几种情况有时也会交叉发挥作用，外部势力干预的手法之一是扶持一个国内代理人以获得某种“合法性”，各国社会革命、军事政变和政党轮替的背后，往往可以看到外部势力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介入与干预。通常情况下，前三种情况的政权变动都不会导致国家领土的分裂，只是经由和平或暴力手段实现领导集团的变更。第四种情况的外部干预有可能只涉及现有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如1931~1945年中国东北的“伪满洲国”、1999年的科索沃）。

在近代历史上，大国解体分裂为几个国家往往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如当年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解体，在近期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中，北约甚至进行了直接军事干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并没有受到强大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而是苏联内部几个加盟共和国提出自决独立的要求，特别是构成苏联人口和经济主体的俄罗斯联邦的议会首先通过《主权宣言》。正是内部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在“民主化”的旗帜下获得合法地位并主导了政治方向，导致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在瞬息之间分裂为15个国家，使全世界甚至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目瞪口呆。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不同于上述政权变动的四种常规模式，而是在特定政治氛围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内部民族主义势力以“民主选举”方式上台导致国家分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西方学者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因素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各国学者都在思考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最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既然苏联是以各民族加盟共和国为单元出现解体，在解体前一些民族共和国（如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的民族主义运动一度高涨，那么民族问题很显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民众对政府不满可以导致政权更替，但是唯有国内政治色彩浓厚的族群民族主义，才有可能导致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民族行政区为单元出现分裂。所以，苏联解体后，西方学者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苏联的“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政策的构建及其社会后果的描述与分析。

作为在冷战时期全面对峙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在苏联研究方面无论是人力和财力都有很大投入。在苏联解体之前，西方学者即开始针对苏联政府的民族理论、民族构建、民族制度、民族政策、联盟制等陆续发表一些研究论文和专著，这些早期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理解。其中美国斯坦福大学康奎斯特教授（Robert Conquest）1986年主编出版的论文集《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已译成中文，该书作者们都是西方国家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顶尖级学者，这本文集提供了苏联社会中族群分层的数据，并对苏联民族关系的演变趋势做了分析，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直至该书英文版出版的1986年，这些学者们仍然认为“目前看来，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对国家的稳定构成紧迫的威胁”^①，这是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致命误判。

苏联解体后，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萨尼教授（Ronald Grigor Suny）1993年出版了《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一书，该书反省了美国的苏联研究的失误根源，并从民族主义角度系统剖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作者指出：“苏维埃俄国……成为把民族原则作为联邦结构的基础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对‘民族’原则的这些让步将会导致‘族群性’的强化而不是消亡。这种预期对于那些（人口规模）较大的民族而言已经得到了证明：苏联并没有成为‘民

^①Rakowska-Harmstone, Teresa, “Minority Nationalism Today: An Overview”, in Robert Conquest (eds.), *The Last Empire—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p. 235~264.

族熔炉’，而是成为‘新民族’的孵化器”。^①该书对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的分析十分深刻。^②其他西方学者也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把民族问题作为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来讨论，如罗得(Philip G. Roeder)特别强调国家行政架构中以“民族”为单元的“区隔化制度”(segmental institutions)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认为这种区隔化制度，“尤其是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联邦主义，为政治家从原有的多民族国家中创造出新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组织方式、动机和机会”。^③

一位旅居苏联多年的印度学者巴赫拉(Subhakanta Behera)特别强调构建“共同文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关键作用。他在讨论和对比印度和苏联在“民族构建”过程的不同做法时指出，凡是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族群间的“共同文化”和凡是近代没有发展出以“共同文化”为基础的“多民族的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nation-states)，都有可能解体。印度独立时曾经受“印巴分治”的冲击，此后印度政府便全力构建“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和全国性的“印度民族文化”(the culture of Indian nation)。苏联则没有真正发展出来“苏维埃民族主义”(Soviet nationalism)，而且相反，在这一时期各个族群却在发展各自“微观层面的民族主义”(micro-nationalism)和各自的群体认同，并发展出各自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潜在愿望。巴赫拉认为，这才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深层次原因。^④

与苏联的情况相比较，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否曾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费孝通教授提出中国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那么中国1949年后的“民族”识别与民族构建工作是否在强化“多元”层面文化继承的同时，弱化了“一体”层面的文化认同？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提法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工作偏差的纠正。如果我们在指导民族工作时注重“多元”而模糊了“一体”这个主线和方向，是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对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的反思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学者不可避免地“痛定思痛”，面对车臣和其他自治共和国持续的分裂运动，努力“亡羊补牢”。俄罗斯不仅调整了话语体系，重新定义了“国家民族”和“族裔民族”，并且在1997年正式废除了国民身份证的第五栏“民族”身份。2000年普京总统当选后即“把俄罗斯的89个联邦主体划分为7个新的联邦地区……普京任命了……驻各区的新的总统代表，……他还获得了罢免共和国与行政区领袖的职务、禁止他们自动成为联邦委员会成员的权力”。^⑤这表明俄罗斯领导人已经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思潮对国家统一的严重威胁，并开始的话语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

在左凤荣和刘忠合著的《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一书中，两位作者把俄罗斯学者在民族研究方面的观点归纳为几点：一是不再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转而强调俄罗斯族的利益在苏联体制下被忽视，^⑥将其视为苏联民族关系危机的根源；二是对列宁、斯大林在

^①Suny, Ronald Grigor,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7~89.

^②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的〈历史的报复〉》，《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③Roeder, Philip G., “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in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Comparative Lesson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

^④Behera Subhakanta, *Nation-Stat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5, p. 18.

^⑤[英]卡瑟琳·丹克斯《俄罗斯政治与社会》，欧阳景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23~124页。

^⑥例如，俄罗斯“1988年生产利润的61%上交中央，若按世界市场价格与其他共和国交易，每年可多收250亿卢布，俄罗斯成为为别人供奶的奶牛，为其他共和国输血的共和国”。参见谭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有新的解释；三是关注斯大林时期对一些民族的镇压和放逐政策；四是对苏联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持否定态度。^①

在对俄罗斯学者的民族问题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时，俄罗斯著名学者瓦列里·季什科夫指出：“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过多承载了陈腐知识的遗产，并且往往缺乏反省的能力。……（因为那些）往日同事们……担负着那么多强调（族体）本体论实质的马克思主义趋向”。^②因此，“处于当今族裔政治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常常是戏剧性的并带有悲剧色彩”。^③

在研究民族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当中，季什科夫应当算是思想深刻并最具反思色彩的一位。他认为，当年“苏联的民族政策设计仓促，……这种社会工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一项有关族裔民族的发明，也就是说，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杜撰民族。……在国家这方面，关键的步骤是把族性加以制度化而成为‘民族’（nationalities），却把这个定义与公民权相联系的任何机会都弃置不顾”。^④同时，他把解体后各地族群冲突（如1990年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事件、1992年车臣-印古什冲突）的思想根源与苏联社会多年构建的“民族”意识形态和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联系在一起，^⑤指出，正是苏联政府构建的民族认同意识和族裔民族主义“使苏联解体后的空间成为一个比赛摧毁、种族清洗及失控暴力的竞技场”。^⑥他赞同挪威学者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的观点，“民族，即民族主义者们的想象的人民，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并非与此相反”。^⑦与其他研究民族问题的俄罗斯学者相比，季什科夫是一位罕见地对苏联建国初期占主导的“民族”定义、“民族识别”的基本方法、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设立与划界方式^⑧提出全面质疑的重量级学者。他认为：“今天，把俄罗斯看成一个合法的民族-国家，一个已被联合国承认为与其他那些多族裔国家（multi-ethnic countries），例如中国、印度、墨西哥、西班牙或者英国——所有这些国家一般都被人们认为是民族-国家。”^⑨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季什科夫把中国视为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并且提出了在俄罗斯联邦构建“国家民族”的政治目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在基础“民族”理论和制度、政策上做出的重大调整及其社会效果应当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与跟进研究。正因为中国1949年后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学自苏联，因此，努力通过各种文献信息和实地调查，对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践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于思考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和发展趋势具有十分特殊的借鉴

- ①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16页。
- ②[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 ③[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 ④[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60页。
- ⑤[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5、297~299页。
- ⑥[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9页。
- ⑦[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 ⑧当年斯大林为“自治共和国”划界的思路也被1949年后的新中国领导人所吸收。如克里姆林宫“把卡巴尔德与巴尔卡尔结合，把卡拉恰伊与切尔克斯相结合。……这种做法后面的普遍动机，就是要建立一些经济上自足的共和国，使山区和山麓的资源结合起来，自然的交通途径与适当的地理结合”。参见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周恩来在1957年谈到为什么要把广西省划为壮族自治区时，认为如果设立壮族集中的桂西自治区，“这样划分，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在交通上，铁路要和广西汉族地区分割；经济上，把东边的农业和西边的工矿业分开。这是很不利于共同发展的，而合起来就很便利了”。参见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7页。
- ⑨[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意义。

四、中国学者对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苏联/俄罗斯的关注远远不及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关注,许多学者的外语阅读范围受限于英语出版物,这个信息来源肯定具有一定局限性。美国学者包括移居美国的俄罗斯学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表达方式的影响,尽管他们观察敏锐,提出的一些观点十分深刻,但是这些观点是否真正符合苏联/俄罗斯的社会实际,对此我们仍然需要阅读俄罗斯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近年来俄国学者季什科夫的一些著作译成中文,^①为国内学者的知识领域填补了空白,但是这样的译著数量仍嫌太少,而且阅读译文和阅读原文毕竟不是一回事。近几年里,国内学者也陆续发表一些分析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②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较少触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民族理论的意识形态根源,很少触及一些最本质的问题如“什么是民族?民族构建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因此许多研究者在进行苏联与中国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时,主要讨论的是制度细节、具体事件和社会现象,对这些议题的讨论很少深入追溯理论源头,也很少把中苏两国民族关系变迁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国际比较的大框架里加以考察。

近两年出版的两本书值得关注。其中一本是2015年出版的由左凤荣、刘显忠撰写的《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该书对国外以及中国的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两位作者在几个重要专题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

(1) 分析20世纪20年代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和推行“本土化”政策的利弊得失,实际上即是分析在“民族识别”基础上推行“民族联邦制”的利弊得失。这些方面的资料信息对于中苏比较研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2) 国内许多学者把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归为斯大林及其后继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两位作者认为,“事实是许多俄罗斯族人觉得联盟没有考虑俄罗斯族人的利益。……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正是这一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现象对中国今天讨论民族优惠政策的社会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3) 在苏联民族关系演变史的讨论中,两位作者认为,赫鲁晓夫时期“为受迫害民族平反,部分恢复民族自治地方,以及扩大民族共和国权利”的做法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却“使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引起了新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强化了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相关的讨论可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和“落实民族宗教政策”过程中一些做法进行比较。

(4) 两位作者认为,在民族冲突增加的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仍教条地对待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还在为加盟共和国进入国际社会创造条件”,天真地认为,只要加强少数民族权益和法制地位就有可能缓和民族关系,正是这些做法在客观上加速推动苏联走向解体。

(5) 该书系统研究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如何“构建国家民族,增加国家认同”。采用的主要举措是:“强调公民的社会属性而不是民族属性;淡化民族意识;不再强化民族特征和强化民族差别,不要求公民确定自己的民族归属;注意塑造国家民族,实现多民族的统一。……不再强调民族区域自治,而是强调联邦主体权利平等”。^③

上述这些议题恰恰也是当前中国民族问题讨论的核心焦点。两位作者大量引用了俄文文件信息与公开出版物,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基础文献和研究素材,并在分析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有创新性的观点。应当说这本书是近年我国学者在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研究成果。

①[俄]瓦列里·季什科夫:《民族政治学论集》,高永久、韩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②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1~33页。

另一本书是何俊芳撰写的《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这本文集的第一部分对俄国学术界在“民族”（文中使用“族体”一词）基础理论方面的探讨进行述评，既包括沙俄时期著名学者如史禄国的研究，也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对“族体”问题的探讨和反思。这是理解苏联民族问题深层次理论根源的重要尝试；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俄语的“民族”概念以及西方“族群”概念的引进对俄罗斯话语体系的影响，涉及对一些重要核心概念的讨论；第三部分集中讨论苏联/俄罗斯的语言使用与人口变迁，在学校语言教学方面，涉及的族群既包括乌克兰这样人口众多的大群体，也包括像卡尔梅克这样的少数族群，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苏联/俄罗斯的少数族群人口变迁；该书第四部分是对苏联/俄罗斯有关民族方面政策法规的分析与讨论。书中各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苏联/俄罗斯的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的分析视角。上述两本书各有特色，它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的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开展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

开展学术研究首先必须掌握丰富和全面的研究素材。从这一角度考虑，苏联/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研究者努力发掘和收集现有各种文字出版物（包括历史文献、报刊杂志、各类书籍等）以及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材料、访谈笔记等，这些文字资料有的直接与民族理论、制度、政策和冲突事件有关，有的属于综合性材料，但是包含了与民族问题相关的部分内容；二是研究者在俄罗斯及前苏联共和国开展实地调查与访谈，从地方资料和口述史的角度，回顾苏联/俄罗斯民族关系的演变历史，在深度访谈中理解当地人对这些变迁的实际感受。在这两个领域，国内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需要与研究苏联/俄罗斯的学者之间加强合作。我国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的外语工具大多是英语，难以直接阅读俄文历史文献、档案材料、统计数据和各类出版物，更难以在俄罗斯和各前苏联共和国开展实地调查和访谈。而我国研究苏联/俄罗斯的学者虽大多具有俄语背景，但是社会科学专业基础不强，两方面的合作可以补充彼此的弱项。

对现有文献出版物的收集与研究，有几方面的工作可以在近期推进。

（一）俄文相关文献档案资料的翻译与研究

在左凤荣、刘显忠的《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一书中，开列了尚无中文译本的9本民族问题文件集、21本研究专著（文集）的书名，以及相关主题的论文的题目。^①即使季什科夫认为某些俄国学者的理论视野有某种局限性，但是如果这些俄文著作及其他重要研究论文能够译成中文出版，仍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研究素材。另外，如果我们能够对前苏联各国解密的苏联时期民族事件、政策文件等相关俄文档案进行发掘，将其重要部分译成中文，也许可以揭示一些更深层次的有关“民族识别”、行政区划等决策的历史脉络，以及对重大民族冲突的事实揭秘。

近些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俄国历史和苏联解体研究的俄文著作，如尼·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鲁·格·皮霍亚的《苏联政权史》（1945~1991），盖达尔的《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的命运》，以及李慎明主编的《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等。这些著作和文集有些章节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也有助于我们把民族问题放在苏联社会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这些方面的翻译出版工作应继续加强。

（二）研究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英文出版物的翻译与研究

苏联解体后，研究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西方学者，以及他们与移居西方国家的俄罗斯学者合作，出版了多部以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为主题的著作与文集。2010年我在《西北民族研

^①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11页、第25页。

究》上发表的对萨尼《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书评的附录中，开列了10本研究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英文著作书目，这只是我自己在本世纪初期购买的部分著作，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英文出版物的实际数量远不止此。特别是那些移居西方的俄罗斯学者，他们熟悉俄文文献与档案材料，吸收了西方学术界的理论视野，享有便利的学术研究条件，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与西方学者合作的成果，无论在历史资料梳理还是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方面，对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都将起到开拓眼界的推动作用。

德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等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有以本国文字出版的研究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有些研究会把苏联/俄罗斯的经验教训与作者本国的国内民族/族群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这是理解民族问题现象十分重要的跨国比较研究视角。如果把有代表性的这些文字的民族研究出版物译成中文出版，可进一步拓展我国学者的视野和理论思考。

（三）关注对已解密的涉华俄文档案资料、政府文件的收集和翻译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发现一些当年沙俄、苏联政府涉及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问题的历史文件与档案资料。众所周知，沙俄、苏联政府曾深度介入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问题，例如清朝后期沙俄军队对中国领土的多次侵占、外蒙古20世纪20年代的独立运动、新疆40年代的“三区革命”和1962年的“伊塔事件”，这些重大事件当年究竟是如何策划与实施的，其脉络至今仍不清晰。另外，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早期民族纲领的影响、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和新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都是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不可回避的重要专题。沙俄、苏联政府的领袖、外交官、学者在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哪些作用？目前仍然存留有哪些后遗症？如果我们能够在俄文档案资料、政府文件的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找到表明这些角色和作用的文献史料，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演变历程和影响因素，无疑极为重要。

（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采用多学科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研究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学者，学科背景大多为国际政治、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这两个专业领域，大多具有俄文阅读能力。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则具有政治学的学科基础，在政治学理论、地缘政治、政治史、外交史等方面有学科优势。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学者熟悉马列经典著作，熟悉苏共和中共文件，在梳理分析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文字话语方面有学科优势。但是，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应当在这一领域的相关专题上发挥作用。例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各有所长，在“民族”话语的概念史、社会族群分层与流动、群体认同意识构建、跨族群政治与文化认同、民族主义运动、语言与教育政策、族群融合机制、宗教与民族构建之间关系、人口变迁对族际关系的影响、群体优惠政策社会效果的分析、族群就业竞争能力比较分析、传统文化保护、跨境族群等专题研究中都可以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并进一步在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推动多学科合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除了对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与出版物进行研究分析外，努力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共和国开始实地调查，分析当地社会现状及发展趋势，是今后我国在俄罗斯研究方面特别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在开展调查时可采用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国内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在对方的协助下开展或合作开展实地调查，共同发表研究成果；第二种是鼓励中国在俄留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在俄罗斯或前苏联各国（中亚、高加索、乌克兰等）开展实地调查，论文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第三种是鼓励俄罗斯或前苏联各国来华留学生回本国开展实地调查或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他们在中国大学的学位论文，其研究成果与导师共享。这样的实地调查可以使研究者获得其他人没有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如抽样方法、问卷设计、访谈提纲）有一定保障，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现实社会最重要的资料信息和创新灵感的来源，这与仅仅在阅读分析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的研究完全不同。尽管在俄罗斯等国开展实地调查的难度很大，但是中国未来的俄罗斯研究一定会走到这一步。

结 语

前文所述，苏联的解体不同于政权变动的四种常规模式，俄国和中国具有共性。在当今大国中，具有上述共性的国家唯有中国和俄罗斯联邦。联邦制与民族区域自治无疑在法律和行政体制上存在本质的差别，但是二者在思想基础（如“民族”的基础理论）、管理体制（“民族”成员的身份区隔与不同政策）、少数民族精英培养（民族院校体系）等方面的深层次思路是十分相似的。因此，中国和俄罗斯最需要苏联时期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开展系统深入研究的。

苏联解体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民族主义浪潮并没有完全退去。联盟解体导致有 2 500 万俄罗斯人成为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其他民族人口也不同程度存在类似跨境居住现象，当年苏联境内对“民族平等”的追求，转而以新形式出现在各新独立国家的内部。联盟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分工体系，使得独立后的各共和国不得不重新组建各自的工业体系，“私有化”和经济重组使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俄罗斯 1997 年的实际人均收入仅为 1990 年的 67.6%，津贴是 1990 年的 52.6%。^①同时，领土之争发生在多国之间，克里米亚以“公投”方式并入俄罗斯，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这两个自治地区事实上已经脱离格鲁吉亚而在俄罗斯控制之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领土争议，至今没有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在一个国家内部很容易协调的土地资源之争，现在变成了国与国之间无解的领土之争。发生在苏联这片土地上影响深远的历史悲剧，是 20 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对于苏联体制和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学者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我国学者，对于作为苏联/俄罗斯近邻的中国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必须系统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个北方的重要邻国，它曾经通过各种手段永久侵占了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俄国的十月革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苏联在抗日战争中支持了中国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帮助了中国的工业化。随后中苏关系的恶化一度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苏联解体前两国才开始恢复交往，在 21 世纪两国又共同面对美国的强势打压而重新靠拢。但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我们对于彼此的了解都实在太少。时代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个局面，这些年国内陆续出版研究苏联/俄罗斯的成果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中国的年轻一代不仅需要了解美国和日本，也需要了解俄罗斯和印度，中华民族必须在对周边重要邻国的深度交流中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思想政治体系与发展道路，也只有在对周边重要邻国的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Research on Ethnic Factor in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MA Rong

Abstract: A cross-state study of Chinese ethnic relations needs to have some reference frames for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Of all the big multiethnic countries, Russia shares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with China and can serve as the most important reference frame for China's ethnic studie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scholars from the West, Russia and China have conducted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the ethnic factor in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and makes some proposals for how to carry out further studies of the ethnic relations in Russia.

Keywords: collapse of the USSR, ethnic relations in Russia, ethnic studies

(责任编辑 张 健)

^①[英]卡瑟琳·丹克斯《俄罗斯政治与社会》，欧阳景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79页。